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希腊哲学史

(修订本)

第四卷(上)

汪子嵩 陈村富 包利民 章雪富 著



人民出版社

希腊哲学史

(修订本)

第四卷(上)

汪子嵩 陈村富 包利民 章雪富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夏 青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哲学史.第4卷上下/汪子嵩等著.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01-011016-5

I. ①希… II. ①汪…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史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250 号

希腊哲学史

XILA ZHIXUESHI

第四卷(上下)

(修订本)

汪子嵩 陈村富 包利民 章雪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97

字数:1350 千字

ISBN 978-7-01-011016-5 定价:265.00 元(上下)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凡 例

1. 本书第一版第一卷成书于 1985 年, 1987 年年初出版。为保持全四卷体例的一致, 后三卷沿袭第一卷。修订版基本上维持原来的体例。

1.1 全书按编、章、节、小节分目, 每编附有一个小结。每卷后面附有书目, 人名、神名、地名等译名的对照表。修订版还增加了索引。

1.2 书目仅列举撰写中参阅过的。

1.3 按当时的通例, 凡外文参考书按姓、名、书名、版本、出版社、年代次序列述, 同时译为中文, 作为“书目”附于该卷之后。在脚注中仅出现作者姓氏、书目和页数, 个别同姓氏而本书都加以引证者, 则姓与名同时出现于脚注中。如第四卷中研究原子论的 M.F.Smith, 研究晚古哲学的 A.Smith, 研究教会史的 J.L.Smith。

1.4 考虑到我国读者难以找到外文资料, 所以脚注中除个别国际通用的文献篇名、残篇或纸草文书用英文或拉丁化希腊名称外, 一律译为中文。

1.5 涉及汉文古籍时遵照中国习惯列注人物与篇名。

2. 受研究对象的制约, 本书涉及大量外文资料, 原则上遵循海外通例, 个别依我国实际情况做些变更。

2.1 Diels 和 Kranz 编的《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残篇》, 按人物列章目, 内分: A. 后人记述; B. 残篇; C. 疑伪资料。本书按国际惯例在行文中注释, 如“DK22B49”指该书第 22 章赫拉克利特的残篇第 49 条。

2.2 柏拉图著作按 1578 年斯特方(Stephan)的编目, 每页分 A、B、C、D、E

五栏(有的为四栏)。如 189D 指斯特方标准页《柏拉图著作集》第 189 页 D 栏。由于斯特方之后人们发现柏拉图著作的成书时间并非 16 世纪人们排定的次序,所以《柏拉图全集》各篇的斯特方标准页是不连贯的。如 *Timaeus* 篇,后人考证为后期著作,斯特方以为是早期的,标准页为 17A—92D。

2.3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按国际惯例采用 1831—1870 年贝刻尔(Bekker)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标准页,每页分 a、b 两栏。如“980a 20”指贝刻尔标准页第 980 页 a 栏第 20 行。按惯例,用小写字母。

2.4 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古代文献,由美国哈佛大学 Loeb 发起和主持,汇编成希英对照和拉英对照两个系列,本书撰稿期间共出版 476 册,之后又有些增补。本书注释通用《洛布希英对照古典丛书》和《洛布拉英对照古典丛书》,在前后文明示所引著作属希英对照或拉英对照情况下,简称《洛布丛书》或《洛布古典丛书》。

2.5 人名、地名中译,基本上采取古希腊语拉丁语的音译。有的按约定俗成处理,如西塞罗,按拉丁语发音,“Cicero”为“Kikero”,目前都用英译发音。

❀ 再版序言 ❀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全四卷分别于1987、1993、2003、2010年出版。为保持全书格式的统一,其他各卷大体上按第一卷的体例执行。时隔近三十年,从出版社到作者,不由得产生某种共鸣式的冲动。出版社想在装帧、排版、格式方面“旧貌换新颜”,作者想积30年研究的经历,利用迄今为止掌握的资料和海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做一个较完善的修订本。然而“心想事成”对我们六位原作者而言,仅是个美好的梦想。现实一些,统一全书个别前后不一的译名,更正个别差错或措词,按国际出版惯例增加一个各卷人名、地名、术语索引,这是做得到的。2011年9月哲学编辑室主任方国根向我们转达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出全四卷《希腊哲学史》新版的消息,考虑到作者的现实条件,新版不作大的修订,仅作个别更正,统一译名和注释规格,增加索引。

现作如下说明:

1.再版的格式、译名、注释方式仍以第一卷为基础。特别是外文资料的注释,现在通行的方式是用原文全称或缩写。我们当时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情况,都用统一的中译文注释,书后附上译名一致的参考书目。此次再版不做大的更动。四卷中人名、地名、书名中译不一致者一般以第一卷为基础,个别采用后两卷的翻释。例如,地名帕伽马、帕加马、柏加玛,一律采用帕伽马;人名如斐洛、菲洛,一律用斐洛;奥利金、俄里金,一律用奥利金,这是教会史、基督教史方面比较通用的译名。姓名同一者,前面另加学派或地名,如同《著名哲学家的生平 and 著作》的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同姓者有好几个,分别译为犬儒的第欧根尼即辛诺普的第欧根尼、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巴比伦的第欧根

尼、塞留西亚的第欧根尼、奥依诺安达的第欧根尼。

2.四卷本原稿从撰稿人、统稿者到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经过好几道手续,此次复查,差错率极小,但是总免不了个别表述或打印方面的差错。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在方国根主任带领下,几人把关,作了更正。撰稿人和读者发现的差错,趁此机会也予以更正。

3.考虑到本书是研究外国哲学的,关于专门术语,从作者到读者都比较熟悉英译,所以索引的排序不用汉语拼音,而用英语字母顺序。索引的格式与海外通例一致。重要的、多次出现的专门术语按内容分类。

4.有关再版的具体工作委托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负责。索引是王晓朝教授安排他指导的博士后陈玮帮忙做的。周展、陈越骅分别承担第四卷和第一、二、三卷的英文目录。刘永亮、尚万里、徐晓燕承担了核查注释、统一体例等方面许多烦琐而又细致的具体工作。浙江大学还提供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在此均表谢意。

5.《希腊哲学史》是1980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之一。之后《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全四卷《希腊哲学史》新版(原名称“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导读及专题研究”)又陆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资助,其中第四卷还获得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重大项目的资助。在此对上述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新版《希腊哲学史》出版之际,自然想到始终如一为我们创造出版条件的人民出版社从社长到编辑以及校对和设计的整个团体。刚完成第四卷接着就出全四卷的新版,是我们做梦都想却不好意思开口的事。初版的四卷五大册,5千多页,而且前两卷当时还没有电子版,工作量可想而知。哲学编辑室主任方国根动员全室力量,各抱一卷重新过目一遍,统一全书格式,耗时一年多成就了这番事业。一个出版社找几位敬业精神的典范不难,难得的是从上到下,从老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几十年如一日持奉这种敬业精神。我们在为人民出版社建社纪念而撰写的《图书出版业的守护神和常青藤》中倾诉了我们二十多年积聚的感受。刻书与收藏起源于古巴比伦和亚述。Nabu是一位刻印楔形文学泥版文书的高手,一生兢兢业业。在

Borsipa 完成了大量口传史诗、铭文、敕令和星相学、天文学的刻印与维护，死后被奉为守护神。之后在 Ashur、Calah、Nineveh 也被奉为刻印业的守护神。近现代发掘的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书就是在这些地方。后来的希腊人发扬了这个传统。古代各行各业的守护神，其实就是人的敬业精神和理想的外化与升华，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代表某种行业、职业的精神、力量、戒律和守则。常青藤是古希腊酒神的生命不息的象征。本书的再版，再现了这种出版行业的守护神 Nabu 的精神。

借此机会，以我们六位撰稿人的名义，向出版社领导、哲学编辑室历任主任、本书责任编辑、校对、美术设计人员以及所有为本书劳心给力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1 年 12 月

❀ 序 言 ❀

汪子嵩

1983年,我们四个人——我和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按年龄顺序)共同商定:由我们承担编写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任务。现在,2008年,经过将近四分之一世纪——25年的风风雨雨,第四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了却了我们的心愿,也可以来谈谈我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四卷本的《希腊哲学史》?我们打算如何写这样的哲学史?回顾一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向读者作个说明和交代,谨请批评指正。

一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伟大的转折点。“文革”结束,广大中国人民从这场史无前例的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拖到崩溃边缘的浩劫中觉醒过来,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大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的文化思想,必须批判长期束缚我们的闭关锁国的极“左”思潮,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向世界,使我们能在现代化世界中恢复应有的大国地位。鉴于当时对于实践标准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党中央由叶剑英同志提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理论问题讨论会,这样就在197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面主办“全国科技界实践标准理论问题座谈会”。

我还清楚地记得:1981年5月,三位北大同学范明生、陈村富、李真到《人民日报》理论部来找我。他们找我不是讨论实践标准问题,而是谈希腊哲学,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决心回头学习和研究希腊哲学了。范明生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北大哲学系,1955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由任华教授指导的,是对柏拉图的对话的研究。毕业以后,历经坎坷,后来终于在1979年从武汉大学调回上海,在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这时候他大概正在酝酿《柏拉图哲学述评》的写作,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当“逍遥派”的研究成果。陈村富是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他们那一班被称为是幸运的,因为那两年正是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科学和知识,他们认认真真念了两年书。1960年毕业,当了任华先生的研究生,专门研究古代希腊哲学。李真比陈村富晚一年入学,他1962年毕业的时候已经风云突变了。他们三位都特别喜欢古代希腊哲学,尤其是对柏拉图的《对话》有共同的兴趣,这主要是受了北大哲学系任华教授的影响。

写到这里,应该对任华先生作点简要的介绍。原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抗日战争以前,有金岳霖先生和沈有鼎先生师生两代主持符号(数理)逻辑的教学研究,有冯友兰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缺少西洋哲学史的教授,只能请北大、燕京的教授来兼课。因此,决定选择自己的毕业生任华先生专门培养,送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清华,担任西洋哲学史教授。他是一位从古代希腊罗马一直到现代西方各个流派的哲学思想多有研究,能讲授专业课程,并通晓古代希腊、拉丁、英、德、法等多种语文的教授。可是他回国以后,很快迎来北平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时和清华教授一起并入北大哲学系,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没有讲课和研究写作的权利。任华先生在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持史料的翻译和编纂工作,在他的领导努力下,由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和《十九世纪俄国哲学》等书的出版,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整整一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精神食粮。1956年为了落实“双百”方针,可以让哲

学系的老教授上台讲课了,第一位登台的便是任华先生,他讲的“西方哲学史”博得学生热烈欢迎。但从1957年“反右”后,1958年上半年又发动了批判“白专道路”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运动。任先生是位谨小慎微的人,只能一再检讨“是我的错”。1962年风向又变了,重提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为了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要加强理论根据,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统编教材办公室”,调集优秀教师编写文、史、哲教材,又选定任华教授担任《西方哲学史》的主编。可是这部教材还没有完全定稿,风向突变,只好中断。“文革”开始,任先生和北大许多教授一样,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任先生经历了这样起伏打击以后,精神上已经崩溃了。任先生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由他夫人料理的,1973年他夫人因病去世后,子女又下乡插队劳动,他生活得非常艰难,终于老病忧郁。这样一位精通西方哲学的前辈学者,陈村富说:“正是任华教授引导我走入希腊的智慧大门”,却只能这样默默地抱憾离去。我们在这里花点笔墨记下他,既表示我们对他的崇敬和哀思,也想告诉后来的学者:在当时的环境里,像任先生一样,不能施展才能而埋没一生的学者是为数很不少的。所以,必须珍重学术的自由!

1981年5月,范明生、陈村富、李真来找我,是想征询我的意见:他们想三人合作,翻译一部西方著名的《希腊哲学史》。是译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E. Zeller, 1814—1908年)在19世纪初版的《希腊哲学史》呢,还是译新近出版的剑桥大学教授格思里(W. K. C. Guthrie, 1908—1982年)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我当时的想法是:策勒的三大卷五巨册的《希腊哲学史》(《史纲》是它的精编本)在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影响很大,从内容到资料的选择,的确都是比较稳妥和合乎理性的;但它终究是一百多年前的学术著作,这段时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学者在复兴思想文化传统上有明显的成果,许多新的观点没有包容在策勒的著作之内。当时我还只能看到格思里的《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他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我觉得其中有些问题是值得再讨论的;尤其是因为古代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老祖宗,正像我们中国学者对于先秦诸子儒、道、名、法之间的思想渊源、继承发展以及相互矛盾等关系是有所了解,无需说明的;而格思里的书,由中国人看来,不免有些费解。最后我大胆提

议:你们三个人,与其通力合作去翻译一部西方人的著作,倒还不如你们自己来编写一部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希腊哲学史》。

二

没有想到的是:编写《希腊哲学史》的任务,最后还是落在我和范明生他们几位身上。

1979年在济南召开全国社会(人文)科学规划会议,当时主持中央思想文教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为了重新恢复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鼓舞士气,并争取中国学术界在世界上应有的学术地位,在会上提出要求学术界通力合作,编写出多卷本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并且在第二年——1980年在福州举行的规划会议上,将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任务,指派给汝信同志、朱德生同志和我三个人负责。我们初步商定将《西方哲学史》定为十卷(不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史,那有另一套多卷本)。并商定其中第一卷古希腊哲学和第二卷古罗马哲学由我具体负责。当时我已经决心脱离报纸编辑工作,回头学习和研究希腊哲学史,主要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己有了初步规划,已经写了几篇论文,后来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发表。现在这样一转变,我便只能和范明生他们一起,担负起编写《希腊哲学史》的任务了。

这时候,姚介厚同志由汝信同志商得国家教委同意,调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协助汝信同志具体负责十卷本《西方哲学史》的工作,他也参加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了。姚介厚同志是我国最早一代去美国专业学习哲学和科学的前辈学者全增嘏教授的学生。全先生1923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和金岳霖、汤用彤、胡适等先后去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等大学担任教授,编译爱因斯坦、牛顿著作选集。1956年创办复旦大学哲学系,金先生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姚介厚与刘放桐等都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优等生。“文革”后期姚介厚被调到北京国家教委工作,1983年由哲学所

选送美国留学,主要研究学习美国当代哲学,但他在全增嘏教授的熏陶下,对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对话》情有独钟,他将我们在十卷本《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分配给他的任务——《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家》初稿,1984年归国时也带回来了。

“文革”后期,政治局面有所松动,“9·13”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他要求深批极“左”思潮,整顿生产秩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饱受“文革”洗礼的知识分子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先是陈村富和李真于1979年在杭州,跟杭州大学教授严群先生进修古希腊、拉丁文。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先生的侄孙,是我国研究希腊哲学史的前辈专家、学者,精通古希腊、拉丁文。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耶鲁等大学学习哲学和希腊、拉丁语,回国后在燕京等大学任教,当时是杭州大学教授。他在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王晓朝、包利民、王来法几位青年学者便是由严先生亲自培育起来的,他们主要学习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希腊、拉丁语。1976年陈村富也被批准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调到杭州大学哲学系任教,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研究希腊、罗马哲学的重要基地。陈村富接任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后,又招收了章学富等研究生。陈村富已了解到:欧美学术界对古代希腊哲学史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以前那样专注于古典时期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时代,集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与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上,转移到后期泛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他们培养的青年学者送往欧美去学习当代流行的希腊哲学史。十几年来他们已经获得重大的成果,发表了多种学术专著,取得博士学位,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本书《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主要撰稿人。在陈村富领导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基地的同时,北方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由苗力田学兄招收了余纪元、徐开来等研究生学习希腊哲学,主要学古希腊语文。他们在苗公主持下,翻译出《亚里士多德全集》12卷,这是用汉语第一次译出的西方大哲学家的著作全集,成为北方研究希腊哲学的重要基地。这南北两个基地互相呼应,对于我们中国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已经作出贡献。由他们培养的这些青年(现在已经是中年)学者,现在已经有的在国际学

术界,有的在国内外学术界作出显著的贡献,今后必然还会有更好的成就!

严复老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对19世纪及以前英国出版的珍贵书籍收藏甚丰,其中很多是有关希腊哲学的学术书籍,这部分书籍大多由严群先生接手。严群先生自己又是一位爱书如命的人,他收藏了20世纪出版的大量希腊哲学的外文书刊。当时严先生家中收藏的有关希腊哲学的学术书籍之多,即便在全国图书馆中,也是居于第一位的。后来陈村富募集中外资助,极大部分钱多是用于购买外文版有关希腊、罗马哲学的学术著作,现在他们收藏的这方面图书的数量,仍然是占全国第一位的。具有这样优越的物质条件,是这个基地的特点,也是我们能够编写这四卷《希腊哲学史》的重要资料基础。

严群先生热爱柏拉图哲学,他留学归国以后便一心从事翻译柏拉图的《对话》。1946—1948年我当北大研究生,并在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会”兼职时,就知道严先生已经译出二十多篇《对话》的初稿,还在反复修改。贺先生和严先生是清华、燕京时代的旧友,贺先生曾将严先生的初稿给我看过。我还记得:在精美的稿纸上,严先生用清秀的行草,一笔笔写得那么端正,令人叹绝。严先生的译文当然深受严复老先生的影响。严老先生是激进的改革家,他翻译“严译名著”时已经抛弃了陈旧的文言文,改用当时适用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的“白话”;但在后来的我们看来,这种白话并没有摆脱原文言文的典雅。正像我们这样七老八十辈写的白话文,在后一辈看来,总是带着陈腐的文言腔一样。语言文字也不能一成不变,后来的终究要接替前者。

在我考虑如何编写《希腊哲学史》时,感到为难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编写《希腊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问题,从研究哲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是“以论代(带)史”呢,还是“论从史出”?

1980年汝信同志向我们传达胡乔木同志关于编写《西方哲学史》的原则意见:“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吸取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学者的创见。”说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就是说不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像我这样已经“思想改造”了50年的人,即使是在参加实践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中,也还没有大胆到认为写书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当我具体考虑到我们要

写的是古代希腊哲学史的时候,却产生了许多问题。多年习惯养成写书必须找到“理论根据”,即从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可以引用的论据。对于古代希腊哲学,我们知道只有马克思早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不同》曾对希腊哲学作过认真的研究,指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不是照搬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是有所前进发展的。但这点终究只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件个别案例,并不能完全据此判断希腊哲学的发展趋向以及历史成就等重大问题。后来马克思很快走出书斋,和恩格斯一起参加社会革命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政党的精神领袖。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捍卫共产主义理论,和形形色色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潮进行斗争。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这样的哲学著作,他们当然没有时间顾及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作学术研究了。幸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发现了列宁《哲学笔记》的手稿,其中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作的摘录和评述,有许多与希腊哲学有关的资料。有的学者已经发现列宁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史的定义: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他的逻辑学)看起来似乎只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推演,实际上却是思想史的概括。所以他说: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等等“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知识领域”。他又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苏联和中国的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列宁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史定义,那就是: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史的概括和总结,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也就是逻辑和思想史的统一。这是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所能接受的哲学史的定义,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写下的,终究可以用来反对那些说“哲学史是唯物论反对并战胜唯心论的历史”那样简单化的教条。并且还可以从《哲学笔记》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一些“语录”,可以用来论证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据”的。我在 1983 年写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的“前言”,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虽然这第一卷是到 1988 年才正式出第一版)。

但是,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我们心里也产生了问题:我们写哲学史,无论是某一历史时代或某一民族国家的哲学史,或是某个哲学流派或某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总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它是在变化发展的。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但在这个统一中,是逻辑决定历史,还是历史决定逻辑?这就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争论的“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这是当时我考虑的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说有两种类型的哲学家:一种是自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或打算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们比较重视哲学的普遍性,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不论中外古今的哲学家的思想都可以综合在一起,为我所用。另一种是我们这样的哲学史工作者,我们认为任何时代、任何学派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实在的、具体的,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要分辨他们之间的不同,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才能找出其发展规律,理清哲学史的发展线索。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中,是逻辑决定历史,还是历史决定逻辑?前一类型哲学家主张逻辑决定历史,所以应该“以论代史”;而哲学史工作者则认为这样做只能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当我对这两个感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一些想法之后,1983年将它写成《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前言”的初稿,和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一起讨论修改。当时已是“反对精神污染”运动高潮后期,为了减轻出版社承受的压力,说明我们这些思想理论多出于经典著作,是有根据的。后来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更加深入,思想更加解放,认识到我们编写《希腊哲学史》,实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具体根据;将从《哲学笔记》中引用的文字删去,可以实事求是地论述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1997年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我们的书,当时的政治局面也有所松动,我们便公开发表了修改过的“前言”。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开座谈会、讨论会,进行个别交谈,我们意识到:胡乔木同志提出的,要在近期内编写出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要求,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再加上多年闭关锁国,对世界已经在迅速发展的学术研究情况毫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写出有世界水平的学术著作?

因此我们议论:是不是由我们四个人先来试写一部四卷本的《希腊哲学史》。究竟我们要写一部怎么样的《希腊哲学史》,打算怎么写?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议,给我们自己定了三点要求:

第一,必须坚持史料是第一位的,我们的论述必须以历史资料为根据,“论从史出”;而不能“以论代史”。

第二,我们的著作主要是介绍和分析古代希腊的主要哲学学派的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包括《残篇》)中的重要思想和逻辑论证,让读者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这是学习和研究古代希腊哲学的基本工作。

第三,我们是要写一部给中国读者看的古代希腊哲学史。古代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老祖宗,西方的知识分子对古代希腊哲学多少有一些必要的知识;正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先秦的儒、道、墨、名、法各家的思想,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写《中国哲学史》时,对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不需要作更多解释,反之则不然。这大概就是许多中国读者读西方学者写的《希腊哲学史》时常常感到困惑的原因。因此我们写《希腊哲学史》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况,对许多中国读者不易了解的事情,多少加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这里就牵涉到翻译问题了。因为我们是要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去翻译西方欧美的语言文字,这是两种不同文本的语言文字,更不用说要用现代汉语去翻译古代希腊的语言文字了。尤其是对古希腊哲学范畴的翻译,问题更多。现在回顾一下,在写本书第一、第二、第三卷时,对两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译名未能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解释,一个是柏拉图哲学的 idea, eidos;另一个是巴